



安史資料

1991



8

农安文史资料

第八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吉林省农安县委员会 文教卫生委员会

一九九一年十月

农安文史资料
第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吉林省农安县文教委员会 编
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 9102028 号
农安县印刷厂印刷

目 录

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大战农安城·····	辛春风 (1)
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孙玉清同志·····	张振龙 (8)
伪吉林师道事件回忆·····	孙维新 (15)
长农支队战斗的回忆·····	李春晓整理 (18)
东卜尔墩果园的创办者孙跃盛·····	张振龙 (27)
东北光复到解放战争后期农安土匪 活动情况纪略·····	辛春风 (30)
松花江畔的俄营垒·····	吴 克 (39)
旧戏班的习俗和行规·····	赵荣久口述吴克整理 (41)
马可考察黄龙戏·····	吴 克 (46)
农安风情点滴·····	孙维新 (48)
金太祖三打黄龙府·····	程 功 (52)
农安县文物志·····	吴铁军 (55)
农安境内三座古城·····	李春晓 (56)
古塔的多种用途·····	李春晓 (60)
后 记·····	(62)

东北民众抗日救 国军大战农安城

辛春风

1932年3月26日，即东北沦陷后第二年的春天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由司令李海青率领，跨越嫩江，经过扶余，直逼农安。鏖战五昼夜，击毙、生俘、收降日伪军千余人。于4月2日挥师北去。为农安后人留下一段李海青率部鏖战农安城的佳话。

一、李海青身世及所属队伍

李海青于1902年生于辽宁省辽中县牛心坨子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。汉族。名忠义、铁城，字汉卿。其祖父为清宫木匠，因给死人清皇太极戴上了帽子，被清摄政王十四阿哥封为镶黄旗，后为满族人。

李海青自幼聪敏。十四五岁时文能成章，武能对人。十六岁结婚，娶妻刘氏美容。刘美容的舅舅张如久，是当时呼伦贝尔的镇守使，兼张作霖东北军第七旅旅长，亦是张作霖的堂弟。李海青婚后，张如久见李海青年少英俊，聪明伶俐，胆识过人，豪爽侠义，便带他们夫妇到了黑龙江。不久，为他找了一位苏联人当家庭教师，教李海青俄语、德语，枪法，飞上火车。由于李海青勤学苦练，不到三年工夫、不仅

学会了俄、德两国一般会话，而且练了一手好枪法、好武功。他飞车、骑马、射击成了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佼佼者。十九岁时，被张如久推荐到中东路的国际列车上当了警长。偶尔，在一次捕捉贩毒集团分子时立功，又被苏联的一位将军青睐，不但得到一把1898年造的骑兵战刀，还到苏联当了赤塔铁路分局的局长。他在苏期间，受张作霖之命，为东北军和西满、北满一带的土匪从苏联购买、运输了大的地军械、炮火。

李海青二十二岁从苏回国后，被张如久推荐给张作霖。张作霖认为李海青是块“好料”，经过一番酝酿，决定由李海青建立一支生死度外，敢打猛冲的“胡子兵”，为张作霖开创一个东北的“水泊梁山”。张作霖当时的目的是，一旦日本入侵东三省，就动用这支精悍的武装力量予以还击。李海青欣然接受这个任务，并同时挂上了吴俊升第三旅副官头衔。为了完成张作霖受命，李海青经常奔波在青岗、望奎、明水、肇州、肇源、兰西一带，穿梭于各个匪络之间，招收了数以千计的土匪。大约又用了五、六个月的时间，就从中挑选了六千多名青壮年，按照旅团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，组成了一支秘密的军队。由于这支武装力量被张作霖视为中流砥柱，不仅得到当时应有尽有的装备，而且还领到了足够军饷和后勤供给。李海青旅的士兵身着灰色新军装，一日三餐三斤六两粮（十六两一斤），三天改善一顿伙食。早五点起床，晚八点睡觉。每天操练五次，午夜一次紧急集合。每年有一、两个营在外野练。旅内严格规定，官兵一律不准穿便服，不准戴金银戒指，不准嫖赌，不准抽大烟。无论谁犯了禁忌，一律受罚。上士以上的受重罚。这支劲旅，经过李海青三、四年的苦心经营，基本达到了张作霖的要求，并成了大青山一带的颇有名气的仁义之师。

不料，到了1928年，张作霖、吴俊升被日本人炸死。这支为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入侵而建的武装力量，一下子成了“黑军”。那时，无为其主。张学良在北京，远离东北。万福麟接替黑龙江省长，又怕得罪了日本人招来烧身之祸。这时，李海青一气之下，回到大青山寨，竖起义旗，专劫辽吉黑官车财物，补充军饷。到了1930年“9·18”事变前夕，李海青出于抗日救国之愿望，硬着脑皮找万福麟商议共同抗日，不仅遭到万的责骂，还把他软禁起来。直到了1931年，万福麟去北京买下西单市场卸职给马占山后，又经过一番波折，他才得以释放，并同马占山一道举起了抗击日军义旗。可是，到了1932年3月初，马占山没有经得住日伪的诱惑，便投靠了日军。李海青3月13日与马占山分道扬镳，竖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大旗并自为司令，率手下十个团，近万人，拼驰于东北抗日战场。

二、鏖战农安县城的经过

李海青举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义旗以后的不久，就率领万人队伍，从青岗、兰西出发，路过“三肇”，渡过嫩江，直奔扶余抗日前线。一路上，由于广泛宣传反满抗日主张，所到之处都打开大户粮仓，分辟银钱财物，解救水深火热的民众，受到广大人民和开明绅士的欢迎。一路上队伍扩大到两万余人，达到了十六个团的兵力。在3月24日攻克扶余县城以后，李海青一面组织力量打扫战场，恢复秩序，一面派出侦探了解农安县城的军事情况。他从侦探回报情况得知：农安县城是伪满首都新京的北边门户，县城内设有日本领事分馆和日本的两家洋行，为日伪的重点防务城镇。当时驻城军队以伪军刘毓坤一个骑兵团为主。这个旅的三个团，有一个团驻在长岭，一个团驻在松花江沿岸，县城里实际上只有刘毓

坤骑兵旅的一个团和一部分吉林军、新京保安队，加上日本警务人员，总兵力不过两千人。城围修筑了1,200米长，4米高城墙，四角设有炮台，各有一门火炮。城南门、西门各有2—3挺重机枪，城北外面50米处设了一道战壕。看来戒备虽然较为森严，但守军纪律松弛，随意出入店铺白吃白拿，少数官兵还抢劫民财，调戏猥亵妇女，很不得人心。李海青得到这些情况以后，立即同副司令张锡伍进行了商量，决定留下新收编的六个团，驻守扶余，自己同副司令张锡伍、副官长刘青林率十个团万余人渡过第二松花江南下，直捣农安县城。

1931年3月26日，李海青先头部队渡过第二松花江后，首先收降了分驻在江南岸瓦房一带的刘毓坤一个团，接着进入哈拉海、小城子一带。3月27日凌晨十个团全部渡江后，分东西南北四路将农安县城团团围住。黄昏时，派一个团将县城南通往长春路两侧的杨树全部砍倒，放在公路上，以阻止日伪军增援车辆通过。派三个团将城外伪军打进县城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进入日伪设的战壕。为全面进攻县城扫清了道路。3月28日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从四面用炮火仰攻城敌，配合政治攻势，迫使日伪军投降。这时，县城日伪军极度慌乱，大声疾呼新京救援。新京急忙调集二十余辆汽车，装上弹药和500多名吉林军，傍晚开到城南公路，刹时被埋伏在公路两边的救国军指战员将押车的伪军全部击毙。出城营救和接应的一百多名刘毓坤部队和30名伪警官，又经过约一小时的激战，只抢回一车军火，其余全部被救国军缴获。

经过这场打援激战，刘毓坤更加六神无主，日伪军也几乎吓得全部丧失了战斗力。李海青针对这种情况，为了避免战耗，写了一封要刘毓坤开城免战，合作共打新京的亲笔

信。可是，刘毓坤又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亲日派。刘毓坤为赢得时间，争取救援，便顺水推舟、将计就计，派出了汉奸、商会会长叶柏青、吴兴久等人到李海青的临时司令部说合，同时带去用马车拉的白糖、烟卷、大烟土。说什么县城里驻有三、四方面的日伪军，有的主张和，有的主张打，希望容缓几天，再开城门。李海青见是把戏，严词拒绝，并让叶、吴捎信，限令3月28日夜十二点前城门必开，否则攻城不待。3月29日早，民众抗日救国军吃过早饭，向县城发起了急攻，步枪、轻重机枪、炮火在县城四周响成一片，县城内日伪军慌乱不堪，有的开了小差，藏起枪支躲进老百姓家，有的携枪投降了民众抗日救国军。这时，县城兵力仅有千余人，坚持携械抵抗。3月29日下午，在县城的日本铁路测量队30余人，见伪军情绪消极，便请求撤离。晚上，日本关东军回电，让其抛弃一切，向窑门（德惠）进发。这伙日本人迅即在日本警察火力掩护下，乘卡车从东门冲出了县城。

3月30日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集中火力，步步进逼西门。有的已进入城墙上，用机枪和步枪射击日伪军，有的在城墙上向里边投掷手榴弹、炸药包。刘毓坤见形势十分危急，便再度向新京疾声呼救。夜里，日本关东军派古田成率500名日军先遣队赶到县城，延缓了民众抗日救国军攻城的进度。

3月31日，日伪又调集了清水支队和张海鹏伪军两千余人扑向县城。这天民众抗日救国军为对付新增加的日伪军事力量，进一步调整部署。两方僵持了一天。

4月1日，民众抗日救国军在调整完力量部署以后，立即以5个团攻城，3个团阻击援敌，2个团为预备队，展开了新的攻城攻势。上午，派出两架飞机，两辆坦克，十多辆装甲车前来助战，均被阻击在路上，城内城外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周

围群众看到民众抗日救国军顾不上吃饭，喝水，就主动地冒着枪林弹雨，带着馒头、大葱和炖好的猪肉粉条，提着开水加白糖的水桶，不断送到民众抗日救国军面前。战斗到中午时分，救国军攻占了北边炮楼，进入城墙以里，西门也相继突进。就在这民众抗日救国军攻打农安县城即将大功告成之际，留守在扶余的马广富团长派人带着扶余告急信到了。信中讲，伪军张海鹏各部人马分两路逼近，一路快到农安，一路由陶赖昭直奔扶余。另肇州伪军张太达也由肇州渡过嫩江南下扶余。还有近万名日伪军也从新京、四平、吉林三处向农安进发，大有南北夹击民众抗日救国军之势。李海青见信后，迅速同副司令张汤伍、副官长刘青林商议对策，决定暂时放弃农安回师扶余。4月1日下午三点，李海青下达了撤兵命令和撤离部署，为了迷惑敌人，他们留下两个骑兵团，把马放在战壕里，士兵一字摆开，分东西南北，先放些枪，再四面猛烈射击。待步兵撤去一小时后，骑兵再撤出阵地。下午四时，救国军冲出战壕，先向西北，后转东北。4月2日晨五点左右，行进到高家店，并消灭了日伪警察分局，收降伪军第九连。当天，踏着即将解冻的第二松花江，安全到达扶余。

三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潜散和李海青之死

李海青长期安家在黑龙省齐齐哈尔市附近的农村，家有良田万顷，房子几十间，为了抗日救国，他把全部家产变卖，购买了军械军需。为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，他同马占山、冯玉祥、吉鸿昌、刘振东、邓文等人合作，转战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热河、察哈尔五省，同日伪军战斗百余次，为阻止日寇践踏我国国土，付出了血汗。直到1935年

6月，李海青才回师兴安岭一带。一次，他去拜泉县城访友，被其干兄弟伪汉奸张振羽看见，张便将李告密给日本人。日本特务机关要求张振羽劝降李海青，如果不成便将其杀掉。一天，李海青受张振羽约会，被骗到拜泉县城“宴海居”饭店，在二人推杯换盏之际，被张振羽用手枪击中头部，当场死亡。李海青的尸首，由饭店老板周立颜出钱，安葬在拜泉百花公墓，与其妻刘美容合葬。潜伏在拜泉一个当铺的李海青的四个子女（三女一男）由当铺的老板指派自家佣人，把三个女孩剪成短发，女扮男装，分乘三辆马车，送到克山县城，后经齐齐哈尔市乘火车回到辽宁老家。

李海青被害后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失去了统帅，自然而然地自讨方便了。有的重新为匪，去杀富济贫；有的放下武器，解甲归田；有的投靠日伪，继续从军。就这样，这个万人之众，悄悄地消逝在大兴安岭的南麓了。

为教育事业鞠躬 尽瘁的孙玉清同志

张振龙

孙玉清同志，农安县华家乡华家站村人，1922年生。1945年肄业于伪长春县开安国民高等学校，1947年在长春市松北联中学习，1950年参加教育工作。曾任兴隆堡乡完小教员、校长和二区完小教导主任、校长等职。1961年，任三岔公社中心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、公社党委委员。1966年8月26日于“文革”运动中被迫害致死，终年45岁。

艰苦创业 勤俭办学

1956年，孙玉清同志从兴隆堡完小调到二区完小（后改为三宝中心校），先任教导主任，后任校长。当时，二区完小既穷且乱，几乎不象个学校。住宿教师想找个菜板切菜都没有。教师思想混乱，不安心教学。孙玉清同志来到后，面对这落后的局面，没有灰心，他相信事在人为，决心靠自己的双手，建设学校、改变落后面貌。为了渡过难关，他投亲靠友，为学校借款，添车买马。课余时间，他带着老师和学生，到野地里刨小根蒜，捡柴，一点一滴地积累办学资金。他每天黎明即起，深夜方归。有时半夜时起来，也要到学校

看一看，给马添点夜草。春耕时，他亲自扶犁趟地，学校忙不过来时，他就让他爱人帮着看犁杖，压碾子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学校先后办起了编织厂、制砖厂、酱菜厂等小工厂，并且养猪养蜂，各项事业初具规模，学校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。

1958年，刮起了“大跃进”风潮，当时，在“大跃进”形势下，全县学校都在停课搞生产。但三宝小学在孙玉清同志主持下，仍是一面学习，一面生产，基本完成了教学计划。1961年调整教学与生产劳动关系时，不少学校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出现单纯抓教学砍生产基地倾向，退地卖马成风。孙玉清同志从农村学校的实际出发，退掉一部分离校较远的耕地，增加经济作物比例，加强畜牧业、林业建设，形成农、林、牧结合的格局，巩固了学校生产劳动基地。这不仅为学生参加劳动锻炼提供了场所，而且增加了办学资金。仅1961年勤工俭学收入达1万元。到1965年，总收入达10万元，年平均收入2万元，相当于一个一般生产队的年收入水平。

孙玉清同志经常说：“校长不为学校和群众办点好事实事，就不是好校长”。他将勤工俭学收入，首先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和改善教学设施上。1959年至1965年，共建房舍34间，添置学生桌椅300套，建立了图书室，购置了大量教具和教学仪器。“大跃进”之风过后，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普遍很困难，一些学生因交不上学费、书本费而辍学。为了使学龄儿童“进得来，留得住”，自1958年开始，他便决定免收学杂费，为全校学生解决课本费。1959年，还为全校学生免费做一套学生服装。这一直延续到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。同时为了减轻群众负担，从1958年至1965年，学校民办教师工资，年年由学校支付，不要群众花费一分钱，在30多

年前，孙玉清同志主持的学校就能做到这一点，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。社队的公益事业，孙玉清同志也是大力支持。1962年，公社办有线广播，学校便资助1,500元；1964年公社办电，又资助7,000多元。60年代初，生产队的资金、畜力严重不足，一些生产队长便向孙玉清同志求援，借车马、借农具、借钱款、换种子，只要学校力所能及，孙玉清同志总是“有求必应”。

普及提高 穿靴戴帽

1962年，三宝公社农业中学下马，学生失学，不少学生含着泪离开了学校。学生们强烈的求学愿望，牵扯着孙玉清同志的心。经和教职工讨论研究后，决定小学戴个中学帽，校舍自己盖，教师自己聘，不要群众、公社、教育局一分钱，将这批失学的学生收过来。当年暑假，孙玉清同志带领全校教师，脱坯、运土、垒墙，经过二十多天的劳动，建成7间新校舍，三宝中心校的中学班按期开学，这在当时省内也是没有先例的。在三宝中心校的影响下，县内一些有条件的小学也相继戴了“初中帽”，为发展中学教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三宝公社中心小学的学区范围较广。东南部有个曲家屯，曲家屯距学校五、六里远，酷暑隆冬，学生上学很困难，小广兴店、金复屯距学校虽然只有3里，但有一条水沟子，夏季低年级学生得涉水上学，很不方便。为了普及小学教育，方便学生上学，孙玉清打破了“教育正规化”的清规戒律，从1962年，先后在曲家屯等四个自然屯“穿上靴子”，将校内低年级班下伸到屯，并分设了四个复式班，做到小学一、二年级学生读书不出屯，三年级时再转入校内学习。

孙玉清同志办学的主导思想是面向农村、适应生产、

服务农民，普及提高并重，培养能文能武两用人材，既为上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，又培养热爱家乡具有一技之长的各类人才。他的办学思想得到市、县教育局的支持和肯定。自1962年，在孙玉清同志主持下，三宝公社中心小学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试验。学制方面，以一个班进行缩短学制试验，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。课程设置方面，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，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，增加珠算、水笔字课时。并开设农业科学试验园地，组织课外农业科学小组，进行不同项目试验。学生课后作业，一般在校内完成，不留或少留家庭作业。课前增设预习时间，培养学生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。寒暑假从农村特点出发，在保证学年总授课时数前提下，增放春耕假、夏锄假、秋收假，缩短暑假，使学生在农忙季节，做点辅助性劳动，减轻家长的负担。同时，还进行了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记分考试方法、作息时间等改革试验。这些探索和尝试，表现出孙玉清同志大胆的改革和探索精神。

通过一系列改革，学生在完成国家规定的课业同时，还学到了一定的农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，养成劳动的习惯。中、高年级班的学生能够学到果树嫁接、剪枝和蔬菜育苗等技术，并回家进行实际操作，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起到一定作用。历年来三宝公社中心小学升中学的成绩，总是名列前茅；回乡学生大都成为生产技术能手和有用的人才，受到社会欢迎。

1965年秋和1966年春，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派调查组到三宝公社中心小学长期蹲点，考察总结教育改革的经验，对孙玉清同志的办学精神和模范事迹，给予积极肯定。在此期间，调查组还深入村、屯，对三宝小学初中班的第一期32名中学毕业生，逐个地做了详细调查考核，除一名智能稍差

外，其余都比较出色，很多人被选为生产队长、会计、民办教师，成为农村骨干，对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发挥了作用。

无私奉献 情暖人心

孙玉清同志自我要求很严，他公私分明，两袖清风，只思贡献，不求索取，兢兢业业，以校为家。除吃饭、睡觉外，天天总是身在学校，心在学校。多年来，他没休过星期天、节假日。除夕之夜，没有一年不是在学校度过的。学校的一草一木，他了如指掌；师生的状况，他心中有数。学校缺工具器物，他就从家中取来；学校卖给教师蔬菜，他总是让教师先拿，大家挑剩的最后一堆留给自己。为给学校节约经费，他外出开会宿平炕，往返常常徒步走，不乘汽车。1966年春，省教育厅工作组，细致检查了学校的历年财经帐目和票据，得出结论：孙玉清同志一物不占，一分不贪。由于长期勤奋忘我地工作，孙玉清同志患了肾结核、睾丸结核。但他天天仍是忍着病痛上班。至1963年秋，病情严重，到长春市医院检查，右侧肾脏和睾丸严重化脓，他手术出院后，便立即到校。1966年春，左侧肾脏和睾丸又感染，他不顾休息，仍继续坚持工作。

孙玉清同志对教师在政治上热情关怀，工作上严格要求，生活上照顾体贴，一言一行，温暖着教师的心。1957年冬，全校教师集中到县整风。春节前，他组织护校教师将粘米碾好，年货办好，分送教师家里。“大跃进”期间，民办教师生活清苦，他用勤工俭学收入，给每个民办教师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0元。为解决新调来教师住房问题，1959年，他主持修建房舍9间，使6名教师的家属迁入新居。1962年秋，民办青年外语教师洪喜民，患脑炎无钱医治，适逢学校也无钱，

孙玉清同志便将学校小秋收采的苍耳装满一大车，卖给供销社，然后亲自带款到县医院交了住院费。洪老师病故后，又给买棺木，帮助料理丧事。教师周铭新，是长春师范学校的高材生，1958年，分配到三宝小学工作。1963年，担任中学班班主任兼语文课。他受孙玉清同志思想和作风影响，工作勤奋，积劳成疾，后来不能站立，便坐在椅子上讲课，经孙玉清同志多次严厉催促，他还坚持讲完课本中《最后一课》这篇课文，方到县医院就诊，然而已是肝硬化晚期，没想到《最后一课》竟成为现实。全校师生都哀伤不已。后来，孙玉清同志又护送他到长春市医院，在手术台上周老师便停止了呼吸。

孙玉清同志刚直不阿，不畏权势，敢于代表教师仗义执言。一位教师的爱人被某大队书记猥亵奸污，这位教师慑于书记的权势，忍气吞生。这时，孙玉清同志义愤填膺，查清事实后，挺身而出，向公社党委揭发此事，经查证核实，这个大队书记受到惩处。孙玉清同志能够坚持原则，不徇私情。一位小学校长既是他的学生，又是公社某领导的亲属，犯了赌博的错误，很多人向孙玉清说情，他坚持秉公办理，报请上级撤消了他的校长职务。

事业未竟“文革”蒙冤

1958年至1965年，孙玉清同志多次被评为省、市、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，中央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王铁、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、副省长徐元泉等领导同志，到三宝公社中心小学视察工作时，对孙玉清同志的模范事迹，都给予很高评价。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吉林日报》、《长春日报》等省市报纸和《吉林教育》，都登载过孙玉清的事迹和